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系统逻辑与优化向度

侯丽娟¹,李海青²

(1.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新兴领域治理效能的战略举措。通过构建“要素-结构-功能-演化”的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明晰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以党组织、“三新”组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为核心主体要素,以政策、资金、信息、人才为关键资源要素,以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为重要外部要素,通过组织结构、制度结构、网络结构的协同耦合,实现整合资源、服务群众、优化治理的核心功能,并呈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从分散参与到协同治理、从管理导向到服务导向的动态演化过程。当前,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分散、运行低效、参与冷漠、模式滞后等现实问题,因而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注重从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和动态性方面的逐级优化,继而构建协同治理的有机生命体、建设层次分明的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融合、适应环境变化与持续优化,旨在最终实现党建引领与“三新”组织发展的深度融合并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高效能治理格局,为新时代新兴领域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与学理支撑。

关键词:党建引领;“三新”组织;新兴领域;基层治理;高效能治理;治理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1]68}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以往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的重要补充和拓展,既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又契合新形势下提升党的建设质量的现实需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式现代化的决定》在阐述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时再次强调,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2]这就为做好新时代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三新”组织)的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三新”组织不仅是社

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也是基层治理场域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践行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战略性场域”^[3],也是落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4]1}。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各类组织积极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5]。然而,在统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基层对于治理的需求可能会同政府主导的能力产生抵牾,从而造成“三新”组织治理资源的无序与浪费问题,因而探寻行之有效

引用本文:侯丽娟,李海青.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系统逻辑与优化向度[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1):30-4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2CFX071)

作者简介:侯丽娟(1994—),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E-mail:houlajuan0612@163.com

的方法路径便势在必行。如何发挥“三新”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事关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亦成为“三新”组织党建工作亟须解决的现实议题。

基层高效能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基层治理的核心,是融性质、作用、角色、地位、使命、责任于一体的使命型政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着代表与表达两大常规功能,而且肩负着整合、分配和引领三大新功能^[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同时,也要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7]。在持续推进党建引领的过程中,党组织凭借嵌入、动员、宣传等方式将组织、资源和制度等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场域。强调党建引领,目的在于更好地对基层各类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协同治理合力,通过党组织的组织网络和工作机制更好地解决基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推动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精细化和科学化,提升治理效能,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同样地,“三新”组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和新兴力量,强调党建引领“三新”组织,既能够确保“三新”组织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避免出现偏离正确轨道的情况,同时又能将这些群体团结在党的周围,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对于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部分研究从组织嵌入^[8]、政党引领^[9]和公共价值^[10]等视角展开,也有研究主张通过党组织的跨界统合与机制创新,重塑基层治理结构,从而系统性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高效能治理^[11]。但鲜有运用复杂系统论来分析“党建引领‘三新’组织”的研究成果。系统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甚至相互依赖的组件构成的复杂整体,并在开放的环境交互中以非线性方式适应和发展^[12],强调从整体出发,全面、动态地把握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复杂

系统论之所以适用于本研究,是因为党建引领“三新”组织涉及多元主体非线性互动、自组织演化与环境适应性等典型复杂特征,传统还原论范式难以解析其内在机制,而该理论恰能提供整体性与动态性的分析工具。因此,本研究聚焦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这一问题,运用系统论方法阐述“三新”组织在党建引领下的再组织历程,阐明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现实问题及其优化向度,这不仅是推动“三新”组织健康发展的内在需求,也能为新兴领域党建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参考与学理启示,还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一、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系统逻辑

系统是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要素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功能,以结构(部分的秩序)与功能(过程的秩序)为核心的层次序列分析^[13]是其核心。本研究以系统论方法为指导,通过“要素-结构-功能-演化”分析框架来把握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内在与外在逻辑机理。

1.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要素分析

系统论中,系统与要素相互作用呈现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组成系统的各要素具有差异性,使各要素在系统中呈现不同的等级秩序,且系统和要素、高层系统和低层系统具有相对性^[14]。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要素可分为三方面:一是主体要素。“无论中国基层治理主体有多少,依然需要一个代表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组织来引领,将党员凝聚起来、将群众组织起来,确保总揽全局、协调各方”^[15]。主体要素是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主要包括基层党组织、“三新”组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党组织就要在贯彻落实中发挥领导作用。要强化政治引领,发挥党的群众工作优势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基层各类组织自觉贯彻党的主张,确保基层治理正确方向。”^[16]党组织是党建引领

的核心所在,“三新”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基层政府与社区是基层治理的主导者和实施者,居民则是基层治理的受益者。二是资源要素。“三新”组织资源要素的整合和协同对于基层治理而言至关重要,关键要依托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优化政策、资金、信息和人才等资源的配置,以此促进基层治理参与者之间的有效协调和协同,从而构建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为降低“三新”组织参与治理的成本、实现精准对接和高效治理,资源的有限性同责任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党建引领与优化要素进行解决。三是环境要素。党建引领“三新”组织要发挥治理能力,必须与其依赖的环境要素进行互动,环境要素是基层治理的外部条件,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才能激发“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使党建引领“三新”组织的效果和质量更为显著。

2.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结构分析

结构是基于对系统要素及其位置、联系、秩序的规律性认识所建立的框架^[17],系统内部各要素通过结构实现优化。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各要素构成有机整体,且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塑造了整个基层治理体系的结构。该整体框架可从组织结构、制度结构和网络结构进行理解:

一是组织结构。根据“三新”组织的特点和需求,基层党组织以楼宇党建、链上党建、党建联盟等新的基层党建组织形式,在其中对应建立项目党支部、联合党支部和流动党员党支部等,将党组织与新经济组织的业务项目紧密结合,实现党的工作与企业发展的深度整合^[18]。通过不断加强与辖区行政机关、传统企事业单位的党建共建工作^[19],确保党组织覆盖所有工作领域和对象,同时构建“区(县)党委—街道(乡镇)党工委—社区党组织—‘三新’党组织”四级组织架构,确保党的组织覆盖基层治理各层面。

二是制度结构。“支配结构的绝大部分是

由行事准则、行为准则以及惯例来界定的。”^[20]制度结构的核心功能在于明确主体要素的行为规范,塑造稳定的预期与行动秩序。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建构,本质上是将党的建设制度嵌入多元行业与领域,通过党建制度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进而依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三新”组织有序参与基层治理。具体而言,党建责任制以明晰党(总)支部、党小组的权责范围为抓手,依据党员管理制度的相关要求,督促党员亮明身份,按期提供志愿服务清单,全面负责指定楼层、楼栋或广场的公共治理事务。该制度嵌入过程不仅强化了党组织自身的运行规范,也通过组织传导机制,推动“三新”组织建立与基层治理相衔接的内部管理制度,从而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提供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运行保障。

三是网络结构。与传统组织相比,“三新”组织是市场和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调组织或个体之间交易或交换关系而形成的中间组织,具有网络交叉效应且呈现拓扑状网络结构,这就使得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具备实现从科层化向扁平化趋势发展的条件,可探索形成“党建+网格划分+互联网技术+网格管理方法”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填补基层治理的罅隙,利于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位的重大问题^[21]。

3.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功能分析

系统论强调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结构所决定的^[22],组织结构决定组织功能,并为组织的既定功能目标所形塑^[23]。“三新”组织党组织是典型的功能型党组织,其功能的发挥既得益于结构优势,又受制于结构的约束,具有明显的整合、服务和治理功能。

一是整合功能。“三新”组织党组织具有跨组织边界的结构优势,能够在特定空间内搭建起组织内外与组织之间的交流沟通、信息汇集、资源整合等桥梁,实现对特定组织对象的柔性整合。通过党建引领,引导新经济组织为基层治理提供技术支持和经济资源、发挥新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为基层治理整合社会资源、调动新就业群体积极性,为基层治理进行信息收

集与反馈,从而实现组织的整合,避免了碎片化、离散化等问题。

二是服务功能。《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指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围绕促进生产经营、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搞好服务”“社会组织党组织要围绕凝聚群众、激发活力、促进发展搞好服务”^[24]。针对特定空间内部的企业、党员、职工等对象,除了提供基本的党务服务,“三新”组织党组织还具有推动行政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等集成式供给的内在优势,能为特定组织对象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综合服务。

三是治理功能。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缺位与短板,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动多元主体在特定治理空间中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其深层意涵在于,通过组织动员与价值引导,使不同主体对基层治理的共同目标形成价值认同与行动共识,进而释放治理效能、促进社会稳定、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与组织覆盖力,实现多重治理的协同增效。这一治理效能的生成,本质上依赖治理体系内部结构的优化与主体关系的重构。在治理生态中,不同组织与主体具有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基层党组织作为治理网络的核心,通过政治统合机制,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推动多元主体形成分工明确、联动高效、互信协作的治理生态链条,能有效抑制因利益分化、信息壁垒或权责模糊导致的治理离心倾向,增强治理体系的整体性与协同性。

4.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演化分析

复杂系统的形成,源于其内部高度差异性的元素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多元主体的协同、客观要素的演变及各子系统间的持续反馈,共同推动了系统适应环境的演化发展。系统在演化过程中,新的有序结构和行为的产生源自系统要素之间局域的、简单的相互作用,再经由非线性的、正反馈的放大而形成^[25]。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本质上是一个由多重主体互动、多层机制耦合与多元规则调适共同驱动的复杂系统演化过程。该过程并非简单的政策执行或组织扩

张,而是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组织嵌入与资源整合,激发“三新”组织从“治理客体”向“治理主体”转化,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在结构、功能与运行逻辑上发生适应性重构的动态演进,具体可从演化阶段、演化动力和演化路径进行分析。

一是演化阶段。根据“三新”组织的不同组织特性,党组织引领其参与基层治理也必然经过起步阶段、发展阶段乃至成熟阶段:起步阶段以“建组织、扩覆盖”为重点,通过单独建、联合建、派驻指导员等方式实现“党组织在场”,延伸治理边界,建立初步联系。发展阶段通过“党建+培训”“党建+项目”等举措,提升“三新”组织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党建、统战、意识形态工作嵌入治理流程,形成双向互动与机制联动。成熟阶段,“三新”组织已能自主参与治理,其角色也从“被引领者”转向“共引领者”,党组织转为赋能者,从而实现制度与文化内化,形成多元共治生态。

二是演化动力。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演化动力,源于内外部环境的协同驱动:从外部驱动看,国家宏观政策持续加码,为“三新”组织嵌入基层高效能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不断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4]4},这为“三新”组织嵌入基层高效能治理提供了顶层设计依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社会工作部等推动的“两企三新”党建专项工程,更是通过经费支持、阵地建设、人才选派等机制,强化了党组织在“三新”组织中的引领功能。这些政策不仅赋予了党建引领以制度合法性,也通过资源输入和身份认可激发了“三新”组织的参与积极性。从技术与治理变革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重塑了基层治理的技术场景,也提升了广大群众对精准化服务、智慧化安防和即时性响应等的期待,倒逼治理模式创新。在此背景下,“三新”组织在党建引领下积极探索“数字党建+网格治理”“平台组织+志愿服务”等新路径,推动治理触角向新兴领域延伸。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治理创新改革的深化,基层政

府逐步转变治理理念,通过购买服务、授权试点、共建共治等方式加大支持“三新”组织参与公共管理的力度,为其赋权增能创造制度空间。从组织内生动力看,党建引领不仅提升了“三新”组织的运作透明度与社会公信力,也拓展了该类组织的资源链接渠道与社会网络关系,既增强了其社会责任感与治理能力,也回应了“三新”组织在合法性建构、资源获取与发展平台等方面的组织发展需求。多重动力交织叠加,共同推动“三新”组织从“边缘参与”向“深度嵌入”演进。

三是演化路径。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演化呈现从党组织“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从“三新”组织分散运作向协同共治、从基层治理“管理本位”向“服务导向”转型的三重递进路径。在组织建设层面,“有形覆盖”是初始形态,表现为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派驻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在“三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实现组织体系的物理延伸;“有效覆盖”则是深层演进,体现为党组织通过制度嵌入、资源链接、议题引导和行动整合等在“三新”组织中发挥政治引领、利益协调与服务凝聚功能,使党建工作真正融入“三新”组织运行肌理。在主体关系层面,“三新”组织初期呈现主体多元、诉求分散、行动碎片等特征,但随着党建平台的搭建与整合机制的完善,在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各类“三新”组织通过项目共担、资源共享、活动联办等方式逐步形成治理合力,实现了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共治”的转变。在治理范式层面,传统的基层治理常以行政管理为核心,而党建引领下的新路径则强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服务资源下沉,实现从“管控型管理”向“回应性服务”的功能转型。这一演进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组织功能深化、主体关系重构与治理理念更新三者交织互构的结果,最终在制度赋能与技术支撑下形成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格局。

二、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跨单位、跨城乡、

跨地域的互动日益频繁,社会形态也从原来与政权对接、互嵌的相对静态状况不断向流动性的状态转变^[26]。社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基层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出了新命题。同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党建工作相比,“三新”领域量大面广、开放性强、流动性高,其党建工作较为薄弱。

1. 资源分散:治理预期与现实需求之间存在差距

资源、服务、管理等要素的合理配置是基层治理中的“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层治理的展开方式,彰显了基层治理的价值导向^[27]。在当前的基层治理过程中,“三新”组织“两个覆盖”存在边际递减现象,组织链条未有效覆盖分支机构、网点站点,且不同层级与性质的治理主体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不仅造成了治理进程的滞后,更因权责错配、职能交叉及多头领导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导致治理实践中出现了协同不足、标准不一与衔接断裂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组织陷入涣散、脱嵌和悬浮化困境。一是供需矛盾。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所涉及的主体要素多元且利益诉求各异、组织间的结构关系复杂,在这一背景下,部分“三新”组织的党组织还没有实现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的深化,面对各方主体所掌握的分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等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并形成合力。更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新兴领域的发展,资源配置不当乃至短缺等问题更加凸显:一方面,资源投入与治理需求错配,如党建经费多用于固定阵地建设,却难以覆盖流动党员的实际服务需求。另一方面,资源供给总量不足,基层党组织在人力、经费、技术手段等方面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困境,且资源配置响应滞后,难以适应新业态、新群体快速演变的节奏,这些问题直接限制了党组织深度嵌入、精准服务和有效动员的能力。二是结构矛盾。部分新兴领域的企业党建工作存在阵地建设不足、经费投入有限、党组织结构不规范及党员管理力度和党员发展数量不足等问题,且囿于信息和资源配置不对称,系统与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作用产生了层级化信息断裂和信

息的整合困境。在此结构下,由于组织链条在新兴领域延伸不足,党建责任在多层级传导中易出现“上紧下松”现象,加之各层级对政策精神的理解易出现碎片化解读等,易导致上级党组织的决策部署在基层末梢面临落实乏力的风险,使党组织本应发挥的政治引领与组织整合作用受限。三是利益矛盾。基层党组织与“三新”组织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职责定位不同,由此可能会诱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条块分割”困境。究其本质在于,系统内部尚未建立起基于共同治理目标的利益协调机制,各主体倾向于依据自身管理逻辑划定权责边界、制定有利于本系统的规则,导致协同动力不足、合作机制碎片化。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难以深度嵌入“三新”组织的实际运作,党组织活动易流于程序化、形式化,出现与业务工作“脱节断链”的现象,进而产生组织运行上的“悬浮化”倾向,即党建与治理“各干各的”,或形成“两张皮”困境,即党建与业务“表面结合、实质分离”。这些问题并非利益矛盾本身,而是利益协调机制缺位下组织整合失效的表现。

2. 运行低效:党建引领与基层治理之间融合不足

任何系统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各系统要确定并把握好自身的系统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手段去实现^[28]。作为完整的系统,党组织和“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共同目标乃是“融合共建”,然而在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同基层治理的融合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一是管理失灵。“三新”组织党组织往往依据自身规模、影响力和行业类别进行划分,那些自身规模和影响力较小、没有业务主管单位的“三新”组织党建工作最终由属地兜底,隶属于所在的街道、园区、商圈等党委。然而,各属地内事务繁多,难以对“三新”组织进行良好的资源保障和政治引领,缺乏必要的指导与管理,加上“三新”组织领域内流动性普遍较强、入党意愿低、党员比例低、组织关系复杂等问题的存在,往往会导致党员摸排兜底不到位、党员教育管理不到位、党员作用发挥不到位等问题。二是自治失序。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党组织的功

能边界与责任定位易出现模糊化倾向,常被置于“政治助手”的辅助角色,其引领作用往往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同时,尽管部分地区已探索建立了党建联席会、社区议事平台、志愿服务队等沟通协调机制,但整体而言,基层党组织与“三新”组织、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制度性沟通渠道仍不健全,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平台存在覆盖不均、运行乏力、实效性不足等问题,这既影响了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影响力,也限制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效率^[18]。“三新”组织对其组织关系隶属的党员具备常态化管理能力,但对非隶属党员缺乏一定的制度性约束权限。在“三新”组织党组织中,党员身份与社会角色虽高度交织,但由于组织边界模糊、党建与治理融合机制不健全,加之缺乏将党员先进性转化为治理动能的激励机制与实践载体,会导致党员教育所提升的政治认同与组织归属感难以有效外溢为参与基层治理的实际行动。可见,主体要素的定位不清与沟通不畅,使基层治理系统呈现无序状态。三是文化失效。在“三新”组织中,由于社会思潮多元、价值观念各异、思想基础不统一,使得党建引领在社会动员和利益整合上面临挑战。“三新”组织内部的多元文化对党组织文化造成了器物与价值的双重冲击,在文化受众的偏好、文化接受的载体及文化倡导的价值均存在矛盾张力下,逐步消解了党组织对“三新”组织的政治引领^[29],不利于基层治理工作的积极展开。

3. 参与冷漠:情感认同与激励措施之间保障不够

“政党的功能就在于组织参与,综合不同利益,充当社会势力和政府之间的桥梁。”^[30]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蕴含的逻辑命题,本质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三新”组织党组织作为整合工具是进行动员的基本力量。在基层治理场域,以“三新”组织为代表的新兴领域群体等社会力量很少参与其中,从而出现了“政府在行动、社会无行动、居民不行动”的局面,造成此局面的原因如下:一是热情不高。情感动员是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路径,然而部分党员由

于思想相对保守等原因,参与意识淡薄,出现以“搭便车”“捞便宜”的心态来对待基层治理事务的问题。尤其在“三新”组织领域,随着社会经济急剧转型,新兴领域的党员对其主人翁身份角色的认识和理解仍处于滞后状态,如“三新”组织中仍存在着“口袋党员”和“隐形党员”^①,其既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也不会勇敢地公开亮明其党员身份。这种“隐身”心态本质上是党员身份认同感弱化、荣誉感缺失的表现;或是担心亮明身份会带来额外的责任与约束,不愿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或是受功利主义影响,将党员身份视为一种“工具”,在有利可图时积极靠拢,而在需要付出、担当时则选择退避。二是动力不足。由于尚未构建起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体系,“三新”组织参与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明显不足,主动性与积极性普遍偏低,这已成为阻滞社会治理整体水平稳步提升的关键瓶颈。部分“三新”组织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发展,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不高,认为参与治理会增加自身负担而缺少相应回报。由于党建工作关注政治功能的发挥与否,“三新”组织则关注其专业性与行业性功能的发挥,二者存在价值理念的冲突。同时,受制于组织嵌入深度不足与资源统筹权限有限,“三新”组织党组织难以提供资源整合共享的平台,导致党建工作缺失或者党建工作形式化严重,出现“组织空转”^[8]。三是制度不全。制度建设是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良好的参与秩序是加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党组织与“三新”组织乃至群众等各主体要素只有在制度的规定框架内才能形成共同的利益纽带并得到保障,整个治理系统方能保持动态平衡,形成具有生机和稳定的治理格局。由于“三新”组织发展时间较短、流动性强,在制度嵌入与规则建构方面仍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性、协同性与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导致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职责模糊、程序缺位、资源错配等“制度空白”与“执行困境”等现象。这种制度供给的滞后与不健全,不仅制约了党建引领的深度与广度,也削弱了“三新”组织参与治理的可持续性与有效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亟待破解的结构性短板。

4. 模式滞后:技术迭代与监督管控之间频率不同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核心抓手,在于构建科学适配、系统完备的党建融合治理模式。从当前实践来看,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融入基层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部分地区仍存在党建工作模式与“三新”组织的发展特点、治理需求不相适配的滞后性问题,从而制约了党建引领效能的充分释放。党建模式滞后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技术风险。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需要对信息技术进行精准性和适应性的运用,以有效提升其信息化、标准化和智慧化水平。然而,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虽为治理赋能提供了技术可能,但也对组织的技术吸纳与系统整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部分“三新”组织因数字治理能力不足,难以有效承接技术更新带来的治理变革,导致技术应用流于形式。二是监督缺位。监督管控是指治理主体对治理行动的过程和绩效进行检查评价、调整控制、激励追责等活动^[31]。随着信息技术更新,基层治理的智慧化水平虽得以提升,但技术赋能若缺乏与之匹配的监督整合机制,反而可能放大既有治理缝隙。在数据孤岛、平台壁垒与权责模糊的叠加影响下,监督主体难以实现信息共享与行动协同,导致监督资源分散和监督链条断裂,尤其在“三新”组织中,由于党建覆盖不均衡、管理权属交叉、利益主体多元,尚未形成整体性、联动性、协同性的监督管控体系,对嵌入其中的基层权力运行难以实施全过程、穿透式监管,进而易催生因监督缺位而滋生的权力滥用、程序失范等风险隐患。三是协同困境。当前,数字技术已以不同方式和程度嵌入基层治理各环节,为党组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及新就业群体之间的信息互通、资源整合与行动协同提供了技术支撑,成为推动多元主体共建共治的重要媒介。然而,技术嵌入并未自动消解组

① “口袋党员”是指流动到新单位后虽转出了组织关系,却把组织关系长期放在口袋里,不转入新单位的党员。“隐形党员”是指脱离原单位流动到外地新单位后,不愿暴露党员身份、不转出组织关系的党员。

织之间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党组织与“三新”组织在资源禀赋、利益诉求、组织逻辑与发展偏好等方面仍存在深层错位,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虽具有整合潜力,但其效能受制于制度性信任缺失与治理结构非对称性,难以有效转化为实质性协同动能,反而可能因数据垄断、平台控制或算法黑箱加剧“数字鸿沟”,形成“技术连接而治理脱节”的悖论局面,严重制约协同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优化向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2]基层高效能治理要求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打破壁垒、聚合资源、政治领航,构建起跨界合作网络,从而实现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快速、精准与系统解决。针对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在资源、运行、参与、模式方面的现实问题,必须从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开放性、动态性等方面进行持续优化。

1. 增强系统整体性,构建协同治理的有机生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1]64}推动“三新”组织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必须首先采取整体性的治理理念,对基层治理理念进行调整优化,提升“三新”组织价值共识的凝聚能力,为组织成员提供共同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使组织成员在目标追求和行为选择上保持协同,进而提高组织的整体效率和执行力,从而增强“三新”组织的内聚力和向心力,推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走向基层“善治”。一是理念更新。传统基层治理常陷入条块分割、资源分散、主体单一的困境,治理理念偏重行政主导与末端处置,而新时代党建引领下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核心在于实现治理范式的根本转型,即从“管控”走向“服务”,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治”,从“碎片化应对”走向“系统性整合”。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

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实践中,这一理念更新集中体现为要素整合与效能融合的深化。如,北京市西城区通过党建引领,打造“小哥驿站”“小哥加油站”等服务阵地,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义诊等暖心服务的同时,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新就业群体在日常工作中以“照片+定位”形式将发现的问题反馈至街道微信群,形成“小哥发现问题-街道快速响应-部门处理问题-反馈办理结果”的闭环机制。这不仅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与敏捷性,更增强了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真正实现了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二是方式转换。治理方式是治理主体达成预定治理目标的途径,确立之后便成为治理主体解决公共事务的固定流程。相较于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有效覆盖和管理,北京市朝阳区围绕激活“三新”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以“共朝美好 凝新向阳”党建品牌为引领,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亮身份”,整合多方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朝阳区推动成立餐饮行业党委,发挥其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同时倡导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和社会服务项目,并引进500余个民生服务类、社会治理类、城市管理类项目,引导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三是功能引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强化共同奋斗的政治引领。”^{[1]40}新形势下以系统思维阐释党建对“三新”组织的引领功能,就是既要突出政治引领功能,尤其在实践中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积极引领“三新”组织做到“两个维护”,自觉贯彻党的主张,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治理中落到实处,确保“三新”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此外,还要重视组织引领功能,分别从机构设置、资源分配、组织拓展等方面协同共建,切实把党的组织体系深入基层末梢,使党建工作在“质”和“量”上实现全覆盖。

2. 完善系统结构性,建设层次分明的治理体系

基层治理体系结构层级的塑造源自科学的顶层设计。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工作导向,不断深化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成为有效践行党的领导的坚强

战斗堡垒。当前,为充分发挥基层治理体系的功能、消弭党建引领“三新”组织结构中存在的内在和外张力,要从战略层面合理规划整个系统结构,通过对系统结构的逐级优化,建构一个要素协同、功能互补、运行有序、层次分明的治理体系:一是打破层级限制,下沉服务职能。在目前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结构框架下,基层治理的重心必须向下移动,这就必须突破传统科层制的层级结构限制,使以条为主的“条块关系”转变为以块为主的扁平化结构^[33]。如,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涉及市、区、街道等多个层级,传统管理模式中各层级之间协调联动难度大,难以高效保障超大规模建设。对此,沙河街道通过成立功能性党委,将市、区、街道和项目方等50余家单位和144名骨干党员集聚,围绕建设目标开展工作,实现了从单向管理到多级联动的转变,进而打破了传统的层级限制,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有效解决了施工绿化迁移、工人住宿审批等诉求。又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将党建引领贯穿于服务新就业群体的全过程,通过“党建带群建,群建促党建”的模式,推动服务职能下沉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点,从而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二是明确层级职能,实现权责统一。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只有明确规定各层级的职能权限才能有效解决责任不清、边界模糊、多头管理等问题,进而避免治理真空和漏洞的出现。如,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构建“区-园-企”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左右联结的工作运转体制,明确了各层级党组织在党建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同时划分95个党建网格,每个网格派驻1名专职党建指导员负责本网格的党建指导与联络对接等工作,确保党的组织建在哪里,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通过明确的层级架构和职责划分,避免了多头管理和责任不清的问题,形成了从区到园区再到企业的清晰管理链条。此外,苏州市吴江区构建的“总站+特色驿站+微驿站”三级阵地服务网络,明确了每个层级的功能和服务内容:总站提供政务服务、就业指导、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特色驿站在微驿站基

础上叠加学习书架、女性专属服务等特色功能;微驿站则提供基础的休息、饮水、充电等服务。通过明确层级职能,实现了服务的全覆盖和精细化,提升了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效避免了管理和服务缺位。三是推动层级协同,激活内生动力。系统论认为系统的活力来源于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合作,激活内生动力是推动层级协同的重要目标。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过程中,内生动力主要体现在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三新”组织的创新活力及社区居民的参与热情等方面,通过推动层级协同,能为各主体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激发其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提升治理效能。

3. 提升系统开放性,促进多元主体的有效融合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体系,是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开放体系,基层多元主体的利益立场相异,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动机,多元主体能否“同向发力”、多种逻辑导致的冲突问题能否化约,直接影响治理创新的运行效果^[34]。因而,新时代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建设应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下,构建起以党组织为核心引领,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共治规范^[35],即从促进信息流通、拓展决策渠道及推动制度创新等方面加以探索。一是促进信息流通,增强主体互信度。系统论强调信息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媒介,开放性促进了信息的流通,使得系统内部各主体能够更好地协调行动,增强互信度。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过程中,开放性使得党组织、“三新”组织、社区居民与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及时获取和共享治理相关信息,从而增强各方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如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通过“七进”党建品牌,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各环节,打破了党建与业务之间的隔阂。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促进党员与其他员工之间的交流,同时将党的政策和企业的发展目标有机结合,确保信息对称。进而,员工对党组织和企业的信任度显著提升,形成了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团队凝聚力。二是拓展决策渠道,提升主体积极性。民主决策是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

重要环节,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进基层、开门问策等渠道提升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决策的民主化,同时使各方主体能够根据自身优势和特点选择适合的参与方式。如无锡经济开发区通过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邀请商圈范围内社区、企业负责人和商户代表等参加,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共同商讨商圈发展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种机制确保了党组织、企业和商户能够共同参与商圈的决策过程,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同时,商圈党委引导企业成立共富联盟,开展社会捐赠、关爱助困等公益活动,极大提升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积极性。三是推动制度创新,保障主体融合。开放性推动制度创新能为多元主体融合提供稳定的制度环境,借助治理制度的创新,各方主体能在明确的规则下开展合作,减少冲突,提升治理效能。如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通过党建引领,推动快递物流行业党建高质量发展,助力物流行业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主要是通过创新“党建入章”“三清单”制度及“评优”激励机制,将物流企业纳入基层治理体系,将党群服务阵地与基层治理需求相结合。

4. 注重系统动态性,以适应环境变化与持续优化

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其内在结构及内部诸要素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充分发挥党建对“三新”组织建设引领的作用,要密切注重系统的动态性,从及时调整治理策略、提升系统适应性、确保治理方向的科学性等方面着手,构建结构清晰、职责明确、灵活高效的“三新”组织党建管理体系,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对其进行持续优化。一是动态监测与反馈,及时调整治理策略。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借助动态监测体系能够及时捕捉社会需求、政策调整、技术进步等环境变化,进而通过反馈机制将这些信息传递到治理决策层,促使治理策略的快速调整。当前,“三新”组织党组织可积极探索数智化技术赋能路径,着力搭建数字党建智能化服务平台,依托大数据开展全流程的数据采集、整合分析、处理转化与实践应用工作,以此快速精准识别并

捕捉不同群体及党员的现实需求,进而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服务质效^[36]。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探索“云”端延伸,通过线上“微阵地”实现便捷沟通和高效服务,将新兴领域党建从“一时一地”拓展到“随时随地”,体现了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二是动态优化治理结构,提升系统适应性。系统论认为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是相互关联的,动态优化治理结构是提升系统适应性和功能的关键。随着“三新”组织的不断发展,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也在变化,治理结构需动态调整以更好地整合各类资源和能力。同时,必须增强对“三新”组织中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教育,对“三新”组织党员定期进行制度规则的宣传和普及,使党员充分了解并掌握“三新”党组织规章制度的内容和要求,增强党员的制度意识和执行力,对违反组织规定的行为要给予相应的处罚。如,安徽天助纺织科技集团通过“学聚创为”党建品牌,将党建工作与企业决策和发展目标紧密结合,通过党企双向互动机制,形成了党的建设和企业经营的良性互动。凭借每周一次集体学习、党课微视频、党建实训基地,对党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制度规则宣传。同时,通过党企联席会、党群议事会等形式,提升党员的制度意识和执行力。三是动态调整治理目标,确保治理方向的科学性。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治理目标需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政策导向及居民的期望进行适时调整,进而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通过动态调整治理目标,创新性地推进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初期聚焦组织建设,建立党建工作联席会,解决党组织覆盖率不足等问题;中期强化思想引领,利用远教平台、学习强国等载体开展党员教育,设立党员先锋岗,发挥党员模范作用;长期则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鼓励其参与公益志愿服务,实现从“服务对象”到“治理力量”的转变,从而真正将矛盾解决在基层。

四、结 语

基层高效能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而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场域,其中各种资源的有效性、与政府责任的无限性、治理主体能力的有限性与基层治理需求的无限性、党组织对上负责与对下服务的矛盾相互交织。新形势下,结合我国“三新”组织党建面临的新旧困难和挑战,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应当紧密结合“三新”组织党建的现实需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系统化思维将党建引领“三新”组织视为整体,将党组织嵌入“三新”组织并不断发展延伸,从而更好地实现“两个覆盖”,强化党的政治引领能力和服务管理水平,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为系统探讨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建设的优化路径,深入破解党建引领“三新”组织参与基层高效能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发展桎梏,以系统论为指导,使党组织能逐步达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点面结合”的状态,更好地协同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全面提升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45.

[3] 李靖,刘清. 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演进逻辑与现代化发展进路[J]. 宁夏社会科学,2024(2):157-163.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5] 王静. 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2):97-107.

[6] 唐亚林. 从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J]. 行政论坛,2017,24(5):5-15.

[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38.

[8] 张冉. 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高质量党建的理论逻辑、现实检视与实践进路[J]. 江西社会科学,2025,45(5):5-16.

[9] 陈家喜.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新变化:基于政党功能视角[J]. 政治学研究,2023(1):122-132.

[10] 文宏,梁家婧.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何以共创公共价值[J]. 行政论坛,2025,32(6):158-170.

[11] 林欣,祁凡骥. 基层高效能治理的机制创新——基于N市A县环保治水的案例分析[J]. 行政管理改革,2025(12):51-60.

[12] MERALI Y. Complexit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Emergent Domai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06(4):216-228.

[13] 冯·贝塔朗菲. 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M]. 林康义,魏宏森,等,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25.

[14] 魏宏森,曾国屏. 试论系统的层次性原理[J]. 系统辩证学学报,1995(1):42-47.

[15] 祝灵君.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4):37-45.

[16] 习近平.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7月3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4.

[17] 杨润聪,洪向华. 以系统观念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3):93-98.

[18] 金庭碧,李美玲. 加强“三新”党建面临的问题及途径思考[J]. 理论视野,2025(4):86-91.

[19] 尹雷,王思贤. 迈向党建统领的社区经营:新阶段城市社区治理的行动自觉[J]. 齐鲁学刊,2025(2):75-84.

[20] 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杭行,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43-44.

[21] 吴青熹. 资源下沉、党政统合与基层治理体制创新——网格化治理模式的机制与逻辑解析[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6):66-74.

[22] 乌杰,主编. 系统哲学基本原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6.

[23] 姚靖. 跨域治理中的联合党组织:样态、结构与功能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2024(6):33-40.

[24] 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6.

[25] 范冬萍. 探索复杂性的系统哲学与系统思维[J]. 现代哲学,2020(4):97-102.

[26] 蒋敏娟.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与社会治理现代化[J]. 人民论坛,2023(7):49-52.

[27] 刘蕊,方雷. 党建治理化: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J]. 探索,2024(3):66-76.

[28] 周叶中,张彪.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法律机制的系统论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2012,(05):142-147.

[29] 聂平平,黄文敏. 势能下沉与动能转化: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图景——一项质性元分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4,25(2):4-16.

[30] 塞缪尔·P·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刘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70.

[31] 陈天祥,陈杰华,蓝云. 全流程制度驱动: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敏捷治理——基于“YX 先锋”移动工作平台的经验分析[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26(5):98-109.

[32]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17.

[33] 孙绍勇,肖健勋. 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演进[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45(4):10-19.

[34] 汤金金. 目标驱动下的松散式联动:基层治理创新的适应性逻辑——基于东镇无房产证小区的案例研究[J]. 湖北社会科学,2025(2):55-67.

[35] 郎帅.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J]. 人民论坛,2021(25):71-73.

[36] 葛笑如,张铁成. 数字技术何以破解农村基层党建“最后一公里”困境?——以苏州市吴江区 D 村为例[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190-200.

The Systematic Logic and Optimization Dimensions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 Hou Lijuan¹, Li Haiqi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 School of Marxism,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Abstract: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in guiding the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is the essential path for uphold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t is also a strategic measure to consolidate the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 and enhance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emerging fields. By constructing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element-structure-function-evolution”,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logic of Party building in leading the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considers Party organizations,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grassroots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and residents as the core elements; policies, funds, information, and talents as key resource elements; and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as important external elements.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coupling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network structures, it achieves core functions of integrating resources, serving the public, and optimizing governance, and reveals a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angible coverage” to “effective coverage”, from scattered participation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from management-oriented to service-oriented approaches. Currently, the process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face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ed resources, low operational efficiency, passive participation, and outdated mode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a systems-thinking approach, focusing on step-by-step optimization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ness, structural design, openness, and dynamism, thereby constructing an organic entity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stablishing a hierarchically clear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and adapting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for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The goal is to achieve deep integr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and to improve an efficient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characterized by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arty building in emerging field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arty building leadership; “Three New” organizations; emerging fields;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ient governanc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